

# 李劫人小说研究

冯昊<sup>1</sup>, 史育婷<sup>2</sup>

(1. 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2. 江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00)

**摘要:** 李劫人作为一位被重新发现的作家, 其小说的文学史地位已经获得认可。目前学界关于其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小说创作接受外来影响、接受传统文化影响、人物形象研究以及其小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地位的研究等方面。李劫人小说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反映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由逼仄走向开放的视野。

**关键词:** 李劫人; 小说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06)01-0096-06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许多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在历史风尘中被重重淹没, 时过境迁, 今日我们重新发现这些作家及其作品时, 不仅会慨叹历史的神秘, 敬畏命运的莫测, 也会对文学有更深刻的理解, 对文学史的撰写有更深层的反思。李劫人就是这样的一位被重新发现的作家。据秦弓在一篇文章中提到, “从《死水微澜》初版的 1936 年到 1981 年间, 专题评论只有一篇, 即羊路由的《谈李劫人的〈死水微澜〉》发表于《草地》1956 年 12 月号。内地出版的文学史著作连李劫人的名字都未曾谈及。大约从 1982 年起才有文学史著作把李劫人写了进去。1988 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 2 卷为李劫人立了一节。1983 年春, 在成都召开首届“李劫人创作学术讨论会”。<sup>[1]</sup>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李劫人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随着研究的深入, 人们对李劫人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甚至引起一些争鸣和讨论。近二十年来, 有关李劫人小说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 一、李劫人小说创作接受外来影响的研究

李劫人自 1919 年 11 月到 1924 年 6 月, 一共在法国留学了四年半的时间。其时, 正是法国自然主义受到批判但还在文坛盛行的时期, 李劫人认真研究过、也翻译过大量的法国文学作品, 其中大都出自于自然主义作家之手, 如其翻译过福楼拜的《马丹波

娃利》(现译为《包法利夫人》)、左拉的《梦》以及莫泊桑的《脂球》(即《羊脂球》)等等。而李劫人的小说也确实反映出其明显受法国自然主义的影响。因而关于李劫人小说创作受法国自然主义影响的研究文章颇有篇数。

刘再复对李劫人小说曾经有过这样的评价: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 如果说《阿 Q 正传》、《边城》、《金锁记》、《生死场》是最精彩的中篇的话, 那么, 李劫人的《死水微澜》应当是最精致、最完美的长篇了”, “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邓幺姑就是中国包法利夫人, 她的性格蕴含着中国新旧时代变迁过程中的全部生动内涵。其语言的精致、成熟和非欧化倾向也是个奇观”<sup>[2]</sup>这一方面说明李劫人小说深受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 另一方面也给研究者一个比较明晰的坐标系, 对其人物形象和艺术手法的研究进行深入分析。鉴于有关人物形象的研究文章比较多, 本文列单节综述。在李劫人小说创作受法国自然主义影响的研究文章中, 应当提的是胡丹的《〈死水微澜〉主题的史诗性与法国自然主义》<sup>[3]</sup>一文。该文认为, 《死水微澜》无论从反映历史的方式, 还是科学写实的创作精神以及女主人公形象塑造等方面看, 都深深镌刻着法国文学、思想文化的影响。作者认为法兰西自然主义大师们那种以史诗式的长篇小说反映时代、历史的恢弘气势给李劫人以潜移默化

收稿日期: 2005-10-19

作者简介: 冯昊(1976-), 男, 江西南昌人,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文学研究。

的熏陶。法国文学的史诗性长篇小说模式和科学写实的创作精神是李劫人《死水微澜》最重要的创作源泉。胡文认为李劫人小说创作从法国文学中吸取了众多的创作方法,如李劫人放弃自己早期短篇那种万能评判的叙述角色,而采用摄影师式的方式,拍摄生活的画面以追求小说叙述的客观性。至于法国文学常常在小说中写“史”,李劫人也把小说当作历史来写,在内容上具有相当的历史文献性,使得其小说在中国历史小说创作上独树一帜。特别应该注意的是法兰西民族人格独立、男女平等的思想意识也为李劫人小说注入全新观念,如《死水微澜》女主人公形象的塑造。《死水微澜》一反自然主义单纯强调人的遗传性与生物性之弊,而使人物爱情的发生、发展、高潮随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而细节描写上,坚持不与人以齷齪的刺激。正如作者所说,李劫人从三部曲的创作伊始,就思考着怎样把重大的社会历史现象反映出来。综上所述,胡丹认为相较于传统文学的滋养、现实生活的赐予,李劫人的小说创作受法国文学的影响是非常直接明显的,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

其实早在1989年,伍加伦就在《李劫人与法国文学》<sup>41</sup>中提到李劫人在向外国文学吸取有益的营养时,采取有鉴别和选择的态度,固守着民族的根基,坚持着独立自主的精神。因此,外国文学带给他的总是积极的影响和健康的因素。刘晓林《论李劫人的文学选择》<sup>51</sup>中也提到李劫人创作的出现与成熟依赖于中西文化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融汇。作者认为李劫人是将法国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当作有历史渊源联系的整体来认识的,他更重视经由自然主义发展而体现的真实客观的叙事风格,冷静科学的理性作风,以及历史生活的整体性观念。他的文学选择的内在机制使他成为一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意识的作家。而中国新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促成他文学选择的客观依据。真实、客观、全景地再现历史转型期社会生活的追求是他借鉴法国文学创作经验的最根本原因。他对法国文学的借鉴,对他创作的独特性和艺术个性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从总体来看,研究李劫人小说接受外来影响的文章大都也认为李劫人小说是在中国文学中出现的中西影响相融合的一个范例。

## 二、李劫人小说接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研究

李劫人是四川人,他写的作品也大都发表在四

川境内。其小说内容写的也大都都是四川的人和事。因而有关李劫人小说接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其小说的地域色彩成了研究者一个比较集中的着眼点。

1994年邓经武发表《论李劫人创作的巴蜀文化因子》<sup>61</sup>一文。文章提到,李劫人在艺术创作活动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和极为清醒的对乡土文化的皈依态势。《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蜀中风情、乡土地貌和民俗特征的精细描摹。作品中的人物性格、生活语言、服饰起居,无不带有蜀地特征,成为一部近代的巴蜀风俗史。邓经武认为,李劫人小说所表现的社会生活的历史化,人们生存状态的风俗化,特定时代的心理化等特色,正是李劫人小说愈益受人推崇的根本原因,而这些都建立在他自觉地皈依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追求上。之后,有一系列研究有关李劫人与巴蜀文化之间关系的文章。张勇的《郭沫若、李劫人与巴蜀文化》<sup>71</sup>一文从对郭沫若与李劫人的对比分析中来探讨李劫人对巴蜀文化的接受的独特性。他认为郭李二人的创作呈现出迥然不同的艺术风格的原因,主要在于他们承继了西南地区不同源流的区域文化。李劫人主要是受蜀文化的影响较多。张勇认为蜀文化对李劫人的影响体现蜀人的现实风格使李劫人在创作中选择了一条客观稳健的现实主义道路。而蜀文化作为内向型文明的文化气息,使得李劫人这样的蜀地作家在创作时往往不是首先考虑道德的因素,而是更多地考虑体力的因素。此外,蜀文化质朴、从容、睿智、诙谐幽默的天赋,也有助于李劫人幽默讽刺风格的形成。付金艳、董华的《郭沫若与李劫人:四川现代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sup>81</sup>同样也把李劫人和郭沫若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该文层层递进地对两者之不同进行了分析。文章首先比较李劫人和郭沫若的不同家庭背景、不同生活条件,认为这是形成两个人的不同性格和理想的原因。而这种不同最终导致了李郭二人有着不同的生活道路和人生命运。文中说,李劫人的理想抱负是实业救国,对于文学他并没有寄予过人生理想,文学对于他,始终只是一个爱好者和谋生的手段而已。李郭二人对于文学抱有不同的态度和认识,使得他们走上了不同的创作道路:郭沫若以其狂飙突进的浪漫主义风格在“五四”时期开创了现代白话诗的新天地,并与时俱进,在抗战时期又创作出强调时代性、现实针对性与政治尖锐性的历史剧;李劫人以他的现实创作

态度为现代文坛贡献了历史创作的巨作——大河小说系列,为中国的长篇历史小说创作引进了一种新的创作范式。该文认为,过分地强调文学作品的朝代性而忽略了文学作品本身的审美价值,是导致李劫人受到冷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秦弓的《李劫人历史小说与川味叙事的独创性》<sup>[1]</sup>也是值得注意的一篇文章。他在文中提出,李劫人的小说开创了以民间生活的风俗画来反映重大历史变迁的先河,《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三部曲乃是现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历史小说,其文学史意义更在于对历史小说的创新性价值。作者认为李氏三部曲不像传统历史小说那样以少数英雄人物为中心,而主要以平民形象为载体来再现历史。李劫人小说中的一系列女性如蔡大嫂、伍太太、黄太太等,都颇似司各特小说里的“中间人物”,她们并未直接参与重大历史事件,只是同参与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作品中占有重要位置,不仅是联结多种力量的枢纽,更是冷眼旁观历史变迁的审视者。这种人物设定可以看作是对中心人物型或英雄传奇型传统历史小说模式的消解。此外,秦弓认为李劫人小说的叙事结构吸取了摆龙门阵与川剧帮腔的特点,叙事语调带有川味的讽刺幽默,人物语言和描叙语言均有浓烈的巴蜀韵味。曾绍义、邓伟在《李劫人历史小说与巴蜀文化新说》<sup>[9]</sup>一文中,进一步认为李劫人具有自觉地域文化的追求,他把民间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灵魂的栖息地,把自身融入了民间大地,在巴蜀民间天地中寄托着自己的现代追求并发现了民间精神的价值所在。他们认为在李劫人的历史小说中,历史不是理念的形象化,它真实地再现了巴蜀丰富的社会生活,表现出对日常琐碎之事的独特发现与咀嚼,表现出人的生命力和对原始的情欲赤裸裸拥抱生活的开掘。在此文中,曾邓二人还针对李杰在《论李劫人长篇历史小说的内在矛盾》<sup>[10]</sup>所提出“市民文化趣味是李劫人史诗追求的阻碍,主要体现为‘三部曲’中艺术处理上的三个不平衡,即民族精神的表现与民俗风情画之间的不平衡,历史主潮人物的刻画与中间人物的反映之间的不平衡,悲壮的历史主调与平庸的杂音之间的不平衡。”的观点提出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游离于主体的风俗描写其实是李劫人历史小说整体追求的有机组成部分,小说中的历史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这些风俗细节刻画构成的,因而获得了强烈的时空穿透力。曾邓二

人认为李劫人历史小说中的某些独立化倾向,尤其是名胜风俗的描写,以及明显的说书人“入话”的插入、解释痕迹,显示了李劫人小说与蜀文化传统的渊源关系。

权绘锦的《李劫人历史小说中的传统审美因素》一文则试图以美国学者浦安迪所说的“奇书系列”,即明清优秀长篇白话小说作为参照,通过探讨二者在结构方式、人物形象塑造、描写艺术和修辞美学方面的相似或可类比之处,以期达到变换研究思路和拓展研究空间的目的。该文研究角度颇有新意,对李劫人历史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充分发挥和显现了中国传统小说诗学的对偶美学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析研究。

### 三 李劫人小说中人物形象的研究

人物是小说的灵魂,人物塑造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小说创作的成功。李劫人的“大河小说”涉及人物众多,其中有不少人物性格鲜明,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在研究文章中,有关人物形象研究也是李劫人小说研究的一个亮点。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李劫人小说是非常成功之作。

李劫人小说中人物形象最鲜明,被关注最多的当属《死水微澜》中的蔡大嫂。李左人在《论蔡大嫂的性格运动》<sup>[10]</sup>把蔡大嫂的性格运动过程分为以下四个阶段:小家碧玉邓幺姑——掌柜娘蔡大嫂——罗哥的情人蔡大嫂——大户人家太太顾三奶奶。作者认为蔡大嫂最终成了顾天成的俘虏,而顾天成是教会的奴才,所以蔡大嫂也成了被洋人征服的奴隶。作者进而认为蔡大嫂这一形象深刻反映了那一时代阶级斗争情势嬗变和世道人心的微妙,使《死水微澜》成为一部形象化的“小说近代史”。有的论者则认为蔡大嫂的反叛,全是自发的、出自本能的,没有什么先进的思想去支持她,也没有先进的社会势力作后盾,尽管它对封建礼教是极大的冲击,但永远不可能创造出一个新的社会。在这方面,她和那些偷情的崔莺莺、潘金莲又没有本质区别。<sup>[11]</sup>也有文章侧重于挖掘蔡大嫂的个性特征,寻找她性格中的地方色彩。如张勇的《一个独特的艺术形象——蔡大嫂》<sup>[12]</sup>认为蔡大嫂这一形象的独特之处主要表现在蔡大嫂独立自由、不安本分的个性和立足现实、大胆追求的人生态度,她是外在美和内在美的有机融合,具有独特的巴蜀文化意蕴。更有如陈玮的《一个躁动不安的灵魂——论《死水微澜》中的蔡大嫂》<sup>[13]</sup>的

文章甚至认为蔡大嫂的叛逆和改嫁正是她独特个性结构的真实写照,表现出了她人性完整的一面。

在论及李劫人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时,对过分抬高蔡大嫂形象保持冷静思考的文章有索晓海的《浅析蔡大嫂的“川辣子”气质》<sup>[4]</sup>。索认为《死水微澜》中的蔡大嫂气质源于不遵礼法的巴蜀文化传统,对这一气质的反封建意义不宜脱离历史,估价过高。他说无论从人物的思想观念,还是从故事发生年代(1894—1901年)和氛围来看,蔡大嫂都不能算是一个现代新女性。作者在文中提到,蔡大嫂毕竟不同于莎菲、露沙、章秋柳、梅女士这些受过“五四”新思潮熏陶的、具有自觉反封建意识的时代女性。蔡大嫂对于爱情的追求并不源于个性解放的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在她身上还是不曾有的,这种追求只是源于“川辣子”气质的遗传因子——即不遵礼法。蔡大嫂的再嫁成了摆脱当前危机、改变生活处境的绝妙手段。蔡大嫂的这次选择虽不符合现代人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观念,却完全符合她的“川辣子”行为方式。任意夸大蔡大嫂的伦理觉悟,是不合原作主旨的。索晓海的文章认为,那“不同了”的“世道”只是使得区域文化原有的反礼教传统有了更适宜生长的土壤。但这一传统带有自发的、甚至非理性的性质,是与彻底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绝然不同的。索文认为,蔡大嫂只不过是区域文化传统的突出代表。

也有不少论者从蔡大嫂这一形象说开来,总结李劫人笔下一系列女性形象,分析其意义。唐世贵的《李劫人式的妇女形象——李劫人作品的妇女形象研究之一》<sup>[5]</sup>认为李劫人式的妇女形象是一个“追求、拼搏、失败”的悲剧人物群像,都有一个由“奴隶(非人)——斗士(人)——奴隶(非人)”循环式的个人奋斗史。这些形象集中展现了近百年来中国妇女的种种心路历程,尤其是要求个性解放的愿望强烈。丁晨、陆艳的《边域—村姑—佚史——再看死水微澜》<sup>[6]</sup>则通过女性的立场,发掘出被忽视的一种女性生存的普遍状态,通过现代的这一阶段佚史,对激进与保守都貌似疏离,表达出女性直通历史现实的可能。该文以散文抒情般的句子释放出女性在边域的灵动与升腾。

在所有关于人物形象论述的文章中,不应忘掉胡玉伟《李劫人:重建女性神话——“大河小说”情爱叙事的文本阐释》<sup>[7]</sup>一文。该文认为李劫人的情

爱叙事具有理想的色彩和“神话”品格。胡玉伟认为,李劫人大河小说中,最动人心魄的却是那些情爱故事,而有关历史的宏大叙事则显得有些暗淡。李劫人只是想寻找个人和历史的联系,借女人和情爱来写历史,用女性的命运来把握历史的律动,用她们情欲实现的程度来透视社会历史变动与进步的程度。同时胡玉伟也指出,李劫人笔下被传统所不容的男女情爱进展过于自然和从容,几乎没有受到任何传统的阻力和社会的谴责,这是不符合当时中国乃至四川的历史真实的。他认为李劫人的情爱叙事在很大程度上超越和游离于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历史叙事之外,形成一个自足的世界。李劫人避开了现实的悲剧性冲突,在情爱叙事中给了他笔下女性们实现情欲的自由度。然而,这样也使作家在历史叙事的同时,造成理性精神和求实态度的缺位。作者认为李劫人小说的情爱叙事散发出理想的情调并被赋予了神话的品格。而这种创作方式的不足在于作品中的女性被安排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中,未能充分展示那个时代的精神禁锢所带来的情爱悲剧,未能真正进入女人的内心世界。

此外,杨继兴的《死水微澜》中若干次要人物的安排和塑造》<sup>[8]</sup>是为数不多关注李劫人小说非主要人物的一篇文章。

#### 四、李劫人小说在文学史中地位的研究

李士文在《晨曦薄露与旭日初升——李劫人早期小说和《狂人日记》在现代小说发展史上的意义》一文中提出,如果从现代小说的实际面貌出发,则无疑李劫人先于鲁迅创作了现代小说。早在1912年李劫人就发表了白话小说,李士文把李劫人的小说与鲁迅的小说进行了对比,并认为李劫人的作品弥补了古典小说向现代小说过渡的空间,是现代小说的雏形,而《狂人日记》则是现代小说的纪念碑。作者采用一个比喻鲁李小说的关系,“在现代小说发展史上,李劫人早期小说好比晨曦薄露,《狂人日记》好比旭日东升”。<sup>[9]</sup>前面提到刘再复曾说“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如果说《阿Q正传》、《边城》、《金锁记》、《生死场》是最精彩的中篇的话,那么,李劫人的《死水微澜》应当是最精致、最完美的长篇了。”而陈思和教授在他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sup>[20]</sup>中,则从史的角度把现代历史题材的叙事模式分成三种,其中李劫人的《死水微澜》模式,是一种以多元视角鸟瞰社会变迁为特征,突出了民间社会的生活场

景与历史意识。强调李劫人“大河小说”对于当代历史题材的叙事模式产生的深刻影响。

谢武军在《李劫人的创作在我国长篇小说中的地位》一文中<sup>[21]</sup>认为,历史小说在李劫人手里发生了一个大变化。在语言形式上,摆脱了文言文、半文半白或旧语体文,发展为现代白话文;在体裁格式上,旧历史小说惯用的章回体被打破了,对偶呆板的回目被生动活泼的单句或单调所代替,并彻底洗净了“说话”的胎记;在写作手法上,“世情小说”的写法进一步与传统历史小说的写法相融合,外国文学的优秀传统第一次在中国历史小说的创作中被应用,使历史小说摆脱了古典历史小说的传奇性,而具有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和典型性,浸透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张岩泉的《“小说的近代史”——论李劫人的“大河小说”》<sup>[22]</sup>也认为李劫人是白话小说的先驱作家,他的由《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组成的长篇系列,通过特定的时空窗,反映中国近代重大的历史事变,描绘广阔的社会图景,表现各派力量的消长起伏和思想人心的曲折走向,努力把握时代转折和家庭聚散,展示社会思潮和民情风俗,刻画城乡人物和各色性格,堪称以艺术“书记”历史的“大河小说”。并认为李劫人的小说是乡土文学与历史小说作了成功的嫁接的典范。杨继兴在《长篇历史小说传统形式的突破——论李劫人历史小说的独创性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sup>[23]</sup>文中也认为李劫人完全摒弃了历史演义和讲史性英雄传奇的既定创作模式而另辟蹊径。其根本特征是借助于无主要人物和主要情节的全开放性框架,力图把历史还原为由重大历史事件、社会日常生活、家庭私生活组成的宏大生活流,熔政治、军事、风俗史为一炉。

杨联芬的《从曾朴到李劫人:中国长篇历史小说现代模式的形成》一文写得尤其有见地。作者认为在过去十多年的现代文学研究中,确立了李劫人在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创作上的开拓者地位,而实际上,中国历史小说现代模式的开创者是曾朴,李劫人则是其完成者。作者对李曾二人进行了有说服力的对比。他说曾朴与李劫人,均师承法国19世纪小说,以“风俗史”、“非英雄”的审美追求和独立的历史叙述,创作出与传统历史小说演义正史、叙写英豪、表现正统道德完全不同的现代历史小说模式。作者论证曾朴小说的根据是历史家的文字的记载,它们的任务是把文字的记载重新复活为实际的历史,实际

的生活史和精神史,李劫人小说的根据则是实际的历史,实际的生活史和精神史,作者的任务是把实际存在的历史变成艺术的具文,变成小说。杨联芬认为“五四”以来晚清文学在古典与现代之间长期“失重”的研究状况,以及文学史上形成的以“五四”及革命文学为视点的主流话语,遮蔽了中国长篇历史小说现代模式形成的开创者与完成者这一事实。杨也在文中提出反思,他认为在传统的演义体历史叙述被抛弃后,中国的历史小说似乎只有借助一种外来模式才能建立起符合现代观念、表现现代思想和情感的叙述形式。而五四以来中国作家对西方文学的接受和借鉴,更多是注重精神,而忽略艺术的。所以,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最终没有形成曾朴、李劫人式的现代历史小说潮流,而是茅盾式的“社会剖析小说”成为20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长篇小说最常见的模式。

在近20年来,关于李劫人的研究日益增多,研究者一方面开始从更多的角度来探讨李劫人文学创作。除了上述提到的各种研究角度以外,还有如《李劫人、老舍创作中的地理环境之比较》<sup>[24]</sup>通过对比在纵横坐标中确认李劫人创作的特色;有的则如《语言的瑰丽宝库——民俗的百科全书——李劫人长篇历史小说独特风格探微》<sup>[25]</sup>、《〈死水微澜〉的观察艺术》<sup>[26]</sup>从创作手法方面来探讨李劫人创作特色。此外,也有采用向边缘发散,进行交叉研究视角的文章,如《李劫人“三部曲”的民俗学价值》<sup>[27]</sup>。该文认为李劫人小说是成都民俗的活化石、变迁史和多棱镜,对研究清末民初成都民俗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另一方面,目前有关李劫人研究大都囿于上述提到的研究范围之内,研究还有待更多的突破。从倍受冷落到文学史地位的确认,李劫人小说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反映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视野开始由逼仄走向开放。这里面既有历史的原因、政治的原因,更有文学观念不断调整的原因。

#### 参考文献:

- [1]秦弓.李劫人历史小说与川味叙事的独创性[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1):62-66
- [2]刘再复.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J].北京文学,1999(8):21-23
- [3]胡丹.《死水微澜》主题的史诗性与法国自然主义[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2000(9):57-60

- [4]伍加伦. 李劫人与法国文学 [A]. 谭兴国, 等. 李劫人作品的思想与艺术 [C]. 北京: 中国文联公司, 1989. 303
- [5]刘晓林. 论李劫人的文学选择 [J]. 青海师专学报, 1997 (3): 32- 34
- [6]邓经武. 论李劫人的巴蜀文化因子 [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1994 (10): 114- 117.
- [7]张勇. 郭沫若、李劫人与巴蜀文化 [J].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2000 (3): 122- 126
- [8]付金艳, 董华. 郭沫若与李劫人: 四川现代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 [J]. 理论与创作, 2004 (1): 55- 57.
- [9]曾绍义, 邓伟. 李劫人历史小说与巴蜀文化新说 [J]. 海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4 (5): 98- 101.
- [10]李左人. 论蔡大嫂的性格运动 [A]. 谭兴国, 等. 李劫人作品的思想与艺术 [C]. 北京: 中国文联公司, 1989. 190
- [11]谭兴国. 一个封建礼教的叛逆者——论《死水微澜》中的蔡大嫂 [A]. 谭兴国, 等. 李劫人作品的思想与艺术 [C]. 北京: 中国文联公司, 1989. 165
- [12]张勇. 一个独特的艺术形象——蔡大嫂 [J]. 成都师专学报, 2001 (3): 81- 84
- [13]陈玮. 一个躁动不安的灵魂——论《死水微澜》中的蔡大嫂 [J]. 中山大学学报论丛, 2004 (4): 76- 79
- [14]索晓海. 浅析蔡大嫂的“川辣子”气质 [J]. 江汉大学学报, 2000 (2): 12- 15
- [15]唐世贵. 李劫人式的妇女形象——李劫人作品的妇女形象研究之一 [J]. 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1999 (9): 29- 32
- [16]丁晨, 陆艳. 边域—村姑—佚史——再看死水微澜 [J].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5 (3): 66- 68
- [17]胡玉伟. 李劫人: 重建女性神话——“大河小说”情爱叙事的文本阐释 [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2002 (5): 123- 125
- [18]杨继兴. 《死水微澜》中若干次要人物的安排和塑造 [A]. 谭兴国, 等. 李劫人作品的思想与艺术 [M]. 北京: 中国文联公司, 1989. 237.
- [19]李士文. 晨曦薄露与旭日初升——李劫人早期小说和《狂人日记》在现代小说发展史上的意义 [A]. 谭兴国, 等. 李劫人作品的思想与艺术 [C]. 北京: 中国文联公司, 1989. 36
- [20]陈思和.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 [21]谢武军. 李劫人的创作在我国长篇小说中的地位 [A]. 谭兴国, 等. 李劫人作品的思想与艺术 [C]. 北京: 中国文联公司, 1989. 20
- [22]张岩泉. “小说的近代史”——论李劫人的“大河小说” [J]. 高等函授学报, 2002 (4): 27- 28
- [23]杨继兴. 篇历史小说传统形式的突破——论李劫人历史小说的独创性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A]. 谭兴国, 等. 李劫人作品的思想与艺术 [C]. 北京: 中国文联公司, 1989
- [24]张效民. 劫人、老舍创作中的地理环境之比较 [A]. 谭兴国, 等. 李劫人作品的思想与艺术 [C]. 北京: 中国文联公司, 1989. 333
- [25]张玉林. 言的瑰丽宝库 民俗的百科全书——李劫人长篇历史小说独特风格探微 [A]. 谭兴国, 等. 李劫人作品的思想与艺术 [C]. 北京: 中国文联公司, 1989. 105
- [26]顾全华. 死水微澜》的观察艺术 [J]. 成都大学学报, 2003 (1): 77- 79
- [27]张建锋. 李劫人“三部曲”的民俗学价值 [J]. 成都师专学报, 1999 (1): 92- 94

## Studies on Li Jieren's Novels

FENG Hao<sup>1</sup>, SHI Yu-ting<sup>2</sup>

(1.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2.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00, China)

**Abstract** As a re-founded writer, Li Jieren's position in literary history has been recognized. In novel studies, critics now concentrate on the novels' creation influenced by foreign ideas and local traditions, the study on characters' images, and the study on novels' position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ry history, etc. The history and status of the studies on Li Jieren's novels reveals that the study on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s from a short sight to an open sight.

**Key words** Li Jieren; novel study;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